

# 导论

宋怡明 (Michael Szonyi)

如果你拿起这本书，你应该已经认同中国很重要这个前提，因此了解中国也很重要。从某种明显的意义上说，中国一直很重要，而且也将一直如此。地球上五分之一的人口会发生什么情况，固然很重要。但是今天，中国不仅对中国人民自己来说很重要，而且在一些崭新、出乎意料、有趣的方面，对美国 and 全世界人民来说都很重要——这还不只是因为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发挥愈来愈大的作用。现在全世界正面临着许多严峻的问题——从气候变化到经济增长、海事安全，甚至是反恐——如果中国没有参与其中，这些问题恐怕无法解决，甚至都未能有效地解决。中美关系之所以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并不只是在于两国的贸易量，更是因为上述所说的现实情况。

另一个崭新且出乎意料的方面是，中国很重要是因为不管怎样，中国政策在中国境外都有愈来愈大的影响。无论是其“一带一路”计划，还是其对全球渔业资源枯竭所作出的贡献，中央政府和人民的行动都影响着我们。中国在全球思想市场上也发挥着新的作用。在处理经济发展和缓减贫穷、人口老化和精神健康、消除污染问题和推广可再生能源等诸多领域上，中国的一些建议和想法也说得很有道理，值得关注。这并不表示我们应该欣然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处理手法。许多美国人都对中央政府和其政治的某些层面持强烈的反对意见（在这点上，许多中国人也是如此）。尽管如此，我们最好还是要多了解中国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

正因为中国很重要，故了解中国也很重要。从某种明显的意义上来说，现在了解中国变得较为容易。美国人能接触到的有关中国的信息量，几乎和中国经济一样暴增。到访中国的美国游客数量创下新高，甚至有愈来愈多美国人学习中文（尽管人数还远低于学习英文的中国人数）。全球所有主要媒体都在中国现身，意味着当中国登上头条新闻时——就像几乎每天都发生一样——报道这些消息的往往是世界级的记者们。但即使是最优秀、中立的主流新闻媒体，大多亦应当会受制于每日主要新闻的报道。它们往往关注的是最引人注目的东西；记者根本不可能对自己所报道的每一件事都有深入的了解。社会上，有愈来愈多关于中国的资讯都是由中国人撰写的，而他们用英语写作和发表作品的数量和次数都在增长。但是，他们是中国本地人的身份，并不代表他们更充分了解自己国家的情况，因为美国人现在也能通过多年前中国官方媒体的全球性扩张，看到有关中国的报道。意料之中的是，官方媒体对中国的描述有着自己的规程，对中国多是正面报道，就像一些美国媒体多是负面报道一样。因此，尽管关于中国的信息量在增多，但要了解中国仍然是很困难的。我们甚至可以说，正如美国对中国存在贸易逆差一样，两国之间也存在理解逆差。

这就是我们编写本书的原因。我们邀请了36位学者，各自选择一条美国人应该会问，有关中国的过去、现在或未来的重大问题，并让他们逐一解答这些问题。每位作者都是专家；数十年来对这些重大问题的探索和分析有助他们解答这些问题。他们深入思考了各自的问题，在总结概述这些迫切问题的同时仍能窥透其复杂性。

本书每章都道出几个有关中国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信息。有关过去的关键信息是，历史很重要；有关现在的关键信息是，复杂性很重要；有关未来的关键信息是，中国的挑战很重要。

## 过去

究竟今天的中国是全新的，还是历史仍在发挥引领作用？人们很容易会提出这一论点，就是认为历史在现今中国并不重要，过去四十年的巨变意味着未来对中国尤为重要，或者中国共产党从摆脱过往的意识形态承诺，意味着中国着重未来，而不是过去。下这样的结论还为时过早。

首先，就在不久之前，中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时代的其他群众运动中，就曾试图抹杀其历史，但却以失败告终。田晓菲在本书中写道：“（文革的）悖论就在于，这场运动誓要摧毁过去，创造一个新社会，纵使其本身仍深陷在过去中。”本书的许多章都以此为根据，或者以其他理由，来论证历史的重要性。如果不了解历史背景，我们就很难明白为什么中国人民会对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以及对“台独”运动的反应如此强烈。

历史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它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一些历经数个世纪的剧变却依然存在的耐人寻味的传承上。包弼德（Peter Bol）认为，知识分子和政客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长期特征，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政治辩论。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指出，尽管存在种种差异，但习近平在某些方面确实借鉴毛泽东的著作。王裕华则强调中国领导人在面对强大精英阶层的挑战，试图维持权力时，所遇到一并且还将继续遇到一的种种问题。

历史在当今中国之所以如此重要，也许最引人注目和意想不到的原因在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对历史的重视。关于历史的说法，对于中国共产党如何维护其统治的合法性尤其重要，以至于中共中央办公厅在2013年发布了一份文件，禁止公开讨论“历史虚无主义”。这份文件所谓的历史虚无主义，实际上是指对执政党历史的任何批评。中国共产党不再只是声称自己继承一位19世纪德国哲学家的思想，而且还证明其存在的正当性，是建立在继承、传播和促进中国五千年历史的基础上的。

本书中，谈及历史的作者都会同意，要了解中国的过去，关键就是要具备批判性思维（这正是中国共产党所说的历史虚无主义），而不是一个灌输式的官方版本。例如，尽管中国政府和媒体经常暗示，日本在整个20世纪都对中國怀有顽固的敌意，但傅高义（Ezra Vogel）指出这实际上并不准确。同样，关于中华文明的单一起源或者历史上的丝绸之路的主张，都不是建立在客观考古学基础上的中立主张——而是由特殊利益激发的。能够批判性地理解历史，对于明智地判断这些主张，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并不想说，由其历史塑造的中国是独一无二的，甚至是与众不同的。若我们不了解其历史和文化，就无法充分理解任何一个国家、政权或社会。但是，历史在当代政治话语中——更不用说在许多普通中国人的自我认知中——的重要作用，意味着历史在中国或许尤其重要。

## 现在

如果要用一个最能描述当代中国的词语，那恐怕就是“复杂性”了。年长的读者可能还记得1980年代初中国城市的照片，当时苏联风格的混凝土建筑占主导地位，几乎每个人的衣服都是统一的颜色和样式，到处都是自行车。今天的中国已不再是这样——其大城市是创新型建筑、时尚和豪华汽车的中心，但意味深长的复杂性远远超出表象。中国的政治是复杂的；中国的社会是复杂的；中国的人民也是复杂的。即使像“中国拥有威权政治制度”这样看似直白的说法，也变得不再简单直白。中国的党国体制在很多方面都不再经常干预普通民众的生活。但即使在一孩政策结束后，它仍然继续限制普通人的生育选择。党国体制也继续保持着——一个庞大的宣传机器，尽管如李洁（Li Jie）所指，现在对这种宣传的反应通常是具有讽刺意味的。长期以来，西方思维都存在一种天真的观念，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政治制度将变得更像西方国家。现在，我们很清楚中

国正在创造一种新的政治制度。

中国的社会是复杂的。城市和农村、青年和老人、富人和穷人之间，出现尖锐的新分歧。经济增长造就一个新的中产阶级——现在已有数以亿计的人，并仍在不断增长——他们有着新的期望和需求。政府和社会都拥护经济改革，创造了一种马克思和毛泽东都不会认出的新社会契约。在这种新的社会契约中，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对于民众支持当前秩序尤其重要。更广泛地说，改革时代释放了广大而丰富的新社会力量。中国共产党很难适应，也不易控制这些新的社会力量。

这种复杂性不仅清楚体现在社会层面上，也延伸到个人层面。改革大大改变了在当代中国作为一个人的意味。正如凯博文 (Arthur Kleinman) 所说，一种新的“中国人的自我”正在形成——更加个性化和全球化。中国人正在以新的方式回答熟悉的问题——拥有良好的生活意味着什么？他们也在问新的问题，其中一些是他们的父母从未想过的。什么是环境可持续的生活？国家权力的界限应该在哪里？最近富裕起来的慈善家在思考该如何积极回馈社会。在这个宗教信仰时常转变、家庭规范不断改变、医疗体系迅速发展的时代，许多人都在问：怎样才是好的死亡？

同样，我们并不是要说中国比其他社会更复杂或更不复杂。所有的社会都是复杂的。相反，关键是要意识到这种复杂性对我们更理解当今中国尤其重要。

## 未来

几位作者探讨了中国，尤其是中国政府，在未来面临的巨大挑战。中国共产党能成功彻底消除贪腐问题吗？当革命的起源变得愈来愈不重要时，中国执政党还能保持其合法性吗？最重要的是，中国经济还能持续增长吗？与某些只挑好话或坏话说

的分析师不同，我们的所有撰稿人都试图对这些潜在的分歧问题提出不偏不倚的观点。更重要的是，他们探究中国有哪些资源可以应对这些挑战，以及这些挑战将会以有序还是混乱的方式得以解决的可能性。这些问题将影响到我们所有人的未来。

我们的撰稿人向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甚至在一些文章中向全世界人民，提供许多建议。无论中国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无论她是否听取我们的撰稿人的建议，无论它能否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并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我们都可以从中国的经验中裨益不少。这并不是说存在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中国模式"，而只是说中国的经验，无论是其不可否认的成功还是有所裨益的失败经验，都为其他社会提供了一种对策，包括在促进经济发展和减少贫困、老年和精神健康护理，以及在重组教育或生产能源方面。

过去、现在和未来当然是相互联系的。过去作出的政策选择会影响现在的形势，将来也将继续如此——毛泽东时代制定有关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的政策，决定了今天可供中国领导人作出的选择。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地追溯，问一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时期关于政治组织的思想，或者宗教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是如何持续影响中国官员对现在和未来的看法。如马若德所指，某些毛主义政策的重现，有时让人觉得中国正在回到未来。王德威 (David Der-wei Wang) 则指出，一个世纪前中国知识分子对未来的幻像与今天的中国之间存在着惊人的共鸣，使这种想象中的"未来"似乎变成了现实。

各个方面的专家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历史、其复杂性和挑战。我们之所以邀请这些中国专家，而不是其他专家来撰稿，并不是什么秘密。他们都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 (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at Harvard University, <http://fairbank.fas.harvard.edu/>) 的学者。费正清中心在其六十多年的历史中，一直致力于成为世界领先的中国研究机构。尽管该中心的主要焦点仍然是学术研究，但它也

一直担当着公共角色。研究中心的创始人费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 不仅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杰出的中国历史学家, 还培养了像白修德 (Theodore “Teddy” White)、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Harrison Salisbury) 和白礼博 (Richard Bernstein) 等著名记者。近年来, 费正清中心不仅是学者的, 还是政策制定者、持不同政见者, 甚至企业高管的基地。费正清中心的一些成员一直觉得自己有责任走出象牙塔, 协助民众诉说公众舆论和制定公共政策。随着中美关系踏入陌生的领域, 我们认为这种教育和告知政策制定者和公众的公共角色,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